



教研相长七书

JIAO YAN XIANG ZHANG QI SHU

行龙◎主编

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
走向田野与社会（第2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研相长七书

JIAO YAN XIANG ZHANG QI SHU

行龙◎主编

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
走向田野与社会（第2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 / 行龙主编. —2 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 - 7 - 5203 - 2279 - 9

I. ①近… II. ①行… III. ①社会史—研究—山西—近代

IV. ①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9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研相长七书”总序

“教学相长”，可谓耳熟能详。《礼记·学记》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强调教学和研究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教学和研究，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那是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 20 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由“知不足”“知困”，到“自反”“自强”，确实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

2008 年 5 月，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建校 106 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初步总结了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立足前沿、学科融合、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教研相长五个方面所谓的“经验之谈”。其中的“教研相长”如此谈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即为师之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它与不合理的各种考核和晋升条件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社会风气的影响直接相关。我记得，1985 年留校任教后，乔志强先生曾和我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主题就是讲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站不稳三尺讲台，就没有立身之本，青年教师要把过好教学关当作工作后的第一关去认真对待，不得丝毫马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师的忠告铭记心间，即使在最近这些年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我也尽量给本科生

上课,争取上好每一节课。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如此要求,尽管可能会累一点,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心里实在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目前,由我带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已成为国家优秀精品课程,团队也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我们还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开展了“校园历史文化节”“鉴知精品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班”两项活动,有关的教材也在积极的编写过程中。事实证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活动,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研相长绝非空词。

“教研相长”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个好传统。乔志强先生在世时,不仅开拓性地率先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带领众弟子编写《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以此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乔先生仙逝后,我们又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虽然将研究的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10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表现比较突出,许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人员很少甚或没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任务,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严重脱节。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学习轻研究训练,已经成为普遍诟病的问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不足10人,我们既作为研究团队,又作为教学团队,一肩双任,虽苦犹乐,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感,又有一份快乐感。

“教研相长七书”的一个小小意愿,就是把我們长期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实践公之于世,接受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以便继续深化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就“教研相长七书”分别作以简要的介绍：

一、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为乔志强先生“和青年教师的集体尝试”，该书分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与民族；社层变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教养功能；控制功能等。有学者称为“乔氏体系，三大板块”。正文之前有乔志强先生撰写的长达35页的“导论”，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的知识结构、研究社会史的意义、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有评论认为此书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又有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6月中文繁体本，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二、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2004年开始，由我牵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期间，或历史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开课，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该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该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授课的同时，我们就在进行着相关教材的编写，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大家一起讨论，反复修订，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10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该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三、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种，“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

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该书已面世14个年头,昔日的硕士生已成长为大学的教授,我感到很是欣慰。又,正是本书当年的责任编辑郭沂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才催生了“教研相长七书”,对此要对她道一声感谢!

四、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此书可以看作前书的姊妹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生毕业论文修改而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围绕此方向展开。该书所涉内容包括两大类:一类为集体化时代的某个村庄问题的研究,典型农村如西沟、张庄,一般农村如赤桥、剪子湾、道备等;另一类为专题研究,如新区土改、医疗卫生、水土保持、农田水利、文化生活等。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书的副标题一样,各篇论文的形成,都实践和体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论文“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题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现经中心诸位教师讨论,从数十篇中选取十篇结集出版,接受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五、行龙主编、郭永平副主编《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走向田野与社会,是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教研工作中的追求与实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①田野工作是中心和历史学专业每一届学生的必修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学生收获良多。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永济,是我们与永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师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讲授,带领学生在永济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该书收录的学生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田野日记三部分。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9页。

虽显稚嫩，但对我们而言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多年来学生田野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现。

六、行龙著《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该书从我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书分六部分内容，涉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脉络，新的研究领域、田野考察、资料发掘、人物研究及山西大学校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论文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相”，进而吸收各方意见成稿，也可以说是本人“教研相长”的成果。

七、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这个“读本”，或可叫做“选本”，也就是一个教学参考书。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很受学生欢迎。区域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30年来却有那么多的成果出现，既要选的精当，又要使学生爱读，既要有理论方法的引导意义，又要兼顾具体的实践操作，实在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这个读本只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作品，限于篇幅未能收录海外学者的作品（有机会可再编一本《海外读本》），意在使读者减少隔膜感而增进亲近感，这样的初衷或许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留遗珠之憾”，并非一句客套话。

“教研相长七书”编订之际，既有一分欣慰，又有一分忐忑。我们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地从事了相关的教学工作，从大家的谈论中，从学生的反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另外，“教研相长”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过程，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也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的过程。过程之漫长并不可怕，好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时值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新的学期也将开始，愿以“教研相长七书”以为纪念，期望读者诸位多加指教。

“教研相长七书”整理、编排过程中，马维强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以致谢。

行 龙

2016年8月29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目 录

缘起	行 龙 (1)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	
——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1)
山西近代人口问题初探	(24)
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	(55)
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	(62)
山西“丁戊奇荒”的社会史析论	(88)
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	(125)
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	(156)
秧歌里的世界	
——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177)

缘 起

在迎接山西大学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我们决定奉献给读者这本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著作。

山西大学创建于风雨如晦的 20 世纪初，历史系从中斋文学院独立出来，则在炮火连天的 1936 年。自此以后，历史系一直是本校师资雄厚且颇具特色的院系，前辈学者以其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为本系赢得了应有的声誉。不应忘记的是，本系老一代学人如梁园东、阎宗临等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地方历史给予极大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曾有幸聆听郝树侯先生的“山西历史文献”、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研究”等课程，《山西地方史研究》《太原史话》《元好问》等由本系教师撰写的著作都是我们大学时代的必读书目。

1982 年，我有幸考取乔志强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中国近代社会史便成为我迄今为止的主要研究方向。乔志强先生祖籍交城，谙熟山西历史地理，20 世纪 50 年代即有《曹顺起义史料汇编》问世。20 世纪 70 年代末又有《山西制铁史》《义和团山西地区史料》等论著出版。他总是教导我们历史研究要以史实为基础，提倡以小见大，不发空洞的议论，而地域的研究正是学习和掌握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好途径。拙作硕士论文《近代山西人口问题》即是在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也是我逐步熟悉山西历史文献的开端。1992 年，《中国近代社会史》交稿后，先生又力倡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开展对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1998 年由先生做主编，众弟子参加撰写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初步建立了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理论体系。

1995 年仲秋，蒙戴逸先生厚爱，我有幸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就进一步开展区域社会史

的想法求教戴逸、李文海、乔志强等先生，是他们热情的鼓励和肯定，才促使我坚定了决心。近几年来，我除了致力于历史时期山西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研究外，在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山西社会史也成为一个新的主要研究方向。我的基本想法是，区域的即是世界的，史学工作者对自身乡土历史的研究具有田野调查，搜集文献，亲身体验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锲而不舍，必定会有收获。本书即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其中《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由乔志强先生生前和我共同撰写，《山西近代人口问题》增加了文末的附录部分，《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以下分别由张俊峰、郝平、张万寿、赵英霞、毕苑撰写。韩晓莉同志为本书打印、校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此致谢。

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尤其是几位年轻学者的文章，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题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这也是我颇感欣慰的。当然，本书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敬希读者给予批评。

本书出版之际，恰值业师乔志强先生逝世三周年，愿以此书敬献先生在天之灵。

行 龙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伴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发展的步伐，中国社会史研究在传统史学领域中异军突起，成就斐然。然而，迄今为止，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在 21 世纪的走向及其进一步的健康发展。笔者不揣浅陋，现议及三题，愿就教于方家。

一 “专史说”与“范式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复兴伊始，有关其学术定位的问题就一直处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大体而言，社会史复兴的前十年间，多数学者将其定位于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的专门史。最近几年来，又有一些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出发，认为社会史并不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分支，而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此所谓“专史说”和“范式说”。

社会史研究领域出现“专史说”和“范式说”，其实是符合逻辑的顺理成章之事，从社会史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背景来看，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经历。

西方社会史是在批判 19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基础上产生的，兰克史学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是一种“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群众解放运动及全球性世界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传统的生活方

式和传统文化,这一变化同样在思想界及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在批判兰克史学的基础上,一些史学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史学实践反对政治史而从事社会史。其实,早在18世纪,被称为社会史鼻祖的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就不失为一部生动反映该时代法国社会生活图景的不朽史书。德国史家希棱《论古代各国的政治、交通和商业》一书,充分强调人类物质生活如实物、衣服、居住条件等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以描述社会生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史图式。1929年,法国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联合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刊物的名称就显示出他们一反传统史学只注重政治、军事、外交史的倾向,而以经济史、社会史为重的雄心。费弗尔早在其1922年出版的《土地与人类演进:历史地理学引论》中就提出,史学家不能仅限于探究地理因素对于某桩政治、军事事件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是诸民族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物质和精神文化、科学、艺术、信仰、工业、商业、社会阶层和团体的总体发展”。在英国,屈威廉更明确地表述“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可以说,西方社会史是作为反对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而面世的,一些史家也是把社会史作为一门专史来界定的,社会生活诸领域是早期西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社会史学界,尤其是年鉴学派在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其新视角和方法论的意义。《年鉴》创刊伊始的8人编委会中,除了4位历史学家外,还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各1人。其办刊方针首先是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年鉴学派创始人正是考虑到“社会”一词的模糊性和包容性而为刊物命名:“我们完全知道,在目前,‘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而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正因为该词含义‘模糊’。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在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中,新史料、新手段和新技术、结构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全面审视法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展示。巴勒克拉夫对年鉴派史学作过这样的评述:“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

中国社会史的产生与复兴与西方几乎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20

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就曾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种种弊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明显受到社会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冲击。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这一历史的转折在社会生活领域引起了明显的变化，全面地正确地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成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的史学理论，包括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引入我国，史学界越来越感觉到，一个时期以来，以政治史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研究，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与真实，补充既往史学研究模式而丧失的历史内容成为多数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由此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得以复兴。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复兴后，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历史学中的专门史，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关系、社会控制等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完全忽视社会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们一面在呼吁更新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一面在提倡和运用诸如计量法、学科渗透法、比较法和新史料等新的方法和手段，至于其实践的效果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中西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专史说”与“范式说”并不互相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社会史初期的研究对象来说，中西之间某种程度上也有大体相同的范畴，霍布斯鲍姆列举的英国五六十年代“令人感兴趣的社会史研究”课题，就包括人口与家族血缘关系、城市、阶级和社会团体、“心智”、集体意识或“文化”、社会变迁、社会运动或社会反抗现象。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史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

“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其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年鉴派大师布洛克此语应当对我们的讨论有所启迪。

二 “总体史”与“碎化”

西方社会史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高举“总体史”的旗帜向传统史学发起了冲击。在年鉴派创始人那里,总体史应该包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布洛克宣称,“历史不容画地为牢”,“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第二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以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总体史的思想,他不仅坚持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范围说明总体史,而且将地理环境、气候等一切与人类社会相关的领域都视作为总体史关注的领域。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就是总体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而,企图包容一切的总体史设想本身就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无所不有,布氏所谓的“集合的集合”更是无穷无尽。布罗代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一面在不懈地追求总体史的目标,一面又敏锐地意识到“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理想的办法是先就一个问题进行全面叙述,并且一气呵成,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年鉴派史学对总体史目标的设立,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就包括了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人口、劳动力、物价、商业、财政、运输、海盗、宗教、文化、战争等各个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年鉴学派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年鉴派史学也进入“新史学”阶段,新一代的年鉴派代表人物不仅表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而且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心倾向,他们不仅恢复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地位,而且把研究进一步引向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气候、人体、性爱、饮食、起居、举止、死亡、恐惧、民俗、信仰、家庭、婚变、神话、传说、想象等均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诺拉径直将此称为“历史学爆炸”,他公开宣称:“对我来说,正是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处于史学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值得重视的是,总体史是三代年鉴派学人自始至终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他们在

研究领域上各有侧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第三代年鉴派学人研究的重点已不在于全面探索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大量专题性的、地方性的或专门领域的研究。但是，正如勒高夫悟出的那样：“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革新。”

中国社会史学界也有“真正能够反映过去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的一家之言，但这里的社会史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式模式立论，意在通史中应有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内容，此与年鉴派的总体史有着本质的不同。也许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后即被界定为专门史的缘故，或者由于社会史在中国开展的时间有限，史学的“碎化”在中国并没有西方那样强烈的反应。但是，它决不等于说，中国社会史学界没有“碎化”的倾向。由于社会史的定义五花八门，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更是包罗繁芜，许多研究仅满足于题目的新鲜而忽视对社会史理论的体会与领悟，以致陷于具体问题的琐碎考证和欣赏性描述。已经有人讥讽我们的社会史是一个大杂物筐，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包括不了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可以往这个筐里装。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问题。

社会史的定义及其具体研究对象，在中西方社会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是社会史本身的学科特征所决定的。研究者赋予社会史不同的定义和内涵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关键的问题是，学者们只有在充分理解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领悟体验，才能赋予具体研究以“社会史”意义，才能写出真正“社会史”意义上的作品来。要避免社会史的“碎化”现象，关键还是要把握总体史的方向。

有关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表述，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的概括相当全面：“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留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由此可见，总体史并不仅仅限于其研究范围的扩大，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总体史蕴含的主要内容。总体论这个概念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方法论的,只有从认识论上确定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总体性,从方法论上在具体研究中把握总体性,才能“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其实,即使在相当数量的地方性和专题性的研究中,年鉴派史学也都体现出明确的总体史方向。比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其研究对象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其他如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拉杜里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瓦絮代勒的《战败者的观念》等都属于某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它们“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确定和把握总体性,始终保持总体化的眼光,才能使社会史走出“碎化”的阴影。

三 借鉴吸收与“本土化”

如果我们把1929年布洛克和费弗尔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作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史研究开端的话,西方社会史已经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70年来,由年鉴派开创的社会史研究早已走出法国而走向世界,社会史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史学。年鉴派三代学人撰写的一大批震动国际史坛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历史学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年鉴派史学模式是当今国际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最有影响和意义的史学。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在西方问世将近半个世纪后才姗姗走向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闸门一经开启,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勃然复兴。在迄今为止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形式上看,中国社会史学界已经过了对社会史概念与范畴、理论与方法、通史与专史等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讨论;大到系列的社会史丛书、断代的社会史研究,小到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各种各样的专题研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西方社会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如